中國文化的中道性格

羅素杏

孔孟學說爲中國文化的主流，儒家思想的中心，紹承三代禮樂教化，提供人間理想和諧的生活方式，並積極肯定人類的生存價值。二千多年來，由禮所涵養出的道德人格，和由樂所薰陶的雍穆氣象，融鑄成了中國人特有的壯闊、渾成、中正、平和的淳厚生命。這種寓宗教於道德藝術，充滿人文精神的文化傳承，一直是鞏固社會的安定力量。尤其國家政治穩定的時候，文化生活異常活躍，一般人上能盡心無愧，生活上也能盡性興會，過著樸質清淨的生活。尤其士大夫在窮神知化之餘，進（得仕）則可法天成德，親民愛物，退（不得仕）則獨善耕讀，風範百世。因此，宇宙之大，人際之繁，皆能應對進退，合宜適中，安然自在。這就是中國文化眞正高明精微，而又平實廣大的中道性格的具體表現。

追溯禮樂教化之源，既是「上律天時，下襲水土」，使「萬物並育而不相害，道並行而不相悖」

。順天應人而發皇創發的生命哲學，自是人間最安在的生活狀況；所以，漢武帝表彰儒術，定於一尊，未必全是學術的壟斷、文化的專橫，而是孔孟思想所創設出德配天地，道「貫」古今，不偏不倚的中庸之道，確是最適應當時生存時空的情況，因而不得不順勢承認而已。

我們先看孔孟由周易所體得「仁心」的道德創生，是通天人、合內外、一小大的中庸之道，由誠來安心立命。在人事實踐上，便是中正淳厚的仁愛常道，所謂不偏之謂中，不易之謂庸，中者天下之正道，庸者天下之定理。由此可知，儒家體天法天用心的高明與平易。然而，落實到現實社會，面對當時封建極權的無奈，孔子也只有興發：「中庸之爲德也，其至矣乎！民鮮久矣！」的慨嘆。面對極端克己或縱己而無法復禮的激進份子，孔子也只能說：「不得中行而與之，必也狂狷乎！狂者進取，狷者有所不爲也！」，勉人進於道罷了。可見要做個「時中」的君子，合乎「中行」的理性生活，非對生命底層有更深切的體認，生活實況有更多的同情不可。也就是說，儒家除了關注應然的人事常道之外，對實然的時空問題，諸如宇宙人生實相的認識，主客能所人我的統一，非有一番寂照貫澈不可。

中道生活的圓滿，的確是人性光輝的一面；但是，面對現實生命，氣滯質濁，罣碍太多，尤其在政治混亂，（我執作祟），人心危急之秋（諦觀不明），先爲應付生存的苦況，在現實的輪壓之下，疲於奔命的無奈百姓，自會挺而走險，因無知而盲撞，因無行而蠢動，狂妄簡怠，消極墮落，諸惡皆作。此時，儒家原創性的純理性的文化機能故障，無法應急應變。士大夫也容易因承受不住超載的憂患意識而苦悶，只好移情山水，寄興書畫琴棋的消極破悶之中。漢末魏晉南北朝，儒家文化首度罹難，中道精神隱沒。幸經此長期的試煉、波折、覺照、澄明、轉化、提昇，民族生命復甦，重獲全面深切的安頓，中道性格才正式圓熟精純，充實穩健，而得以大全大用。

儒家「仁」德所把握的生命，是常態的道德要求與實踐，寓宗教於人性本善的教化肯定之上，這對靜態的農業社會，和理想單純的士大夫階級，可發揮作用；但在應付失望、不安和複雜情緒的人生

等負面、非理性的問題，却顯得無能。而另一支中國文化才情高蹈的道家，也只一味的逍遙天放玩票，形同太空人（方東美教授的說法），也無補於世道人心。所以此時，儒家的漠視與道家的逃避，都是危機。幸賴佛陀由深觀正見等覺，勇於承担大難的苦痛（留惑潤生的菩薩）。在民族元氣旱乾塗炭之際，得此甘露普潤，寧非中華之造化，民族之福氣，先聖先賢之陰德？佛爲這一大因緣而來，使中國文化得以再生圓滿，充沛穩健！

一般膚淺之士總以爲佛教和一般宗教一樣，只興趣在來世的出路，誤以佛爲灰心滅智，沉空滯寂的消極避世的小乘人。這是未開眼，未開知，而不了究竟正覺所標揭不苦不樂、積極而肯定的中道的眞諦。中道思想表現在根本佛教的三法印上；而所謂的「三法印」，即是三種普遍而永久的理則。佛陀從日常生活中體會經驗，依智覺照出無常、無我及苦的人生眞相，根本破除煩惱惑業的情執，提供世間一個以智爲本的新人生觀，從而了脫拘縛而得究竟心安理得的境界（涅槃寂靜非死寂的不生不滅），而是離垢無壞，離欲自在，大願莊嚴的無生忍境界）。中國文化中道性格即融攝此大乘圓融性德而完美成熟。

由孔孟傳承的中國文化，雖以中庸之道爲生活的基準；但，以情爲本的人生觀，太拘泥於政治社會的浮面，一切寄望在修德教化的「神用」之中，踐仁行義的內聖外王下，難以突破時空的障碍。雖正言「爲天地立心，爲生民立命，爲往聖繼絕學，爲萬世開太平」的胸襟偉業，但也在舉世滔滔，汲汲戚戚，回頭已是百年身的慨嘆聲中，低吟「盡人事，聽天命」、「不怨天，不尤人」的逆來順受的灰色樂觀中成了或狂或狷的性情人物。至於政客們，巧用文字經濟簡括的多歧方便，故意曲解誤用，成爲淫威的工具，却美其名爲王法，妄與天理並舉。且生命耗費在血緣的疊架之下、鄉誼的溺情之中，生活成了妥協苟安的「奉獻犧牲」，（因文化的腐化僵固），或成了極端世故圓滑的鄉愿與衞道者，最後禮教吃人，人事多乖，「天道遠，人事近」的吶喊也聲嘶力竭。存在意義未參，生命本質未透，悲心薄弱，願力不足，雖有濃重的救世情懷，徒然高唱而已。最後苦難的同胞，紛紛迎佛自度度人，自

利利人去了。

儘管佛教的理論因教派的分歧，極其龐大繁複，然而佛陀的根本思想是以空爲根據的緣起論，以中道的原理爲正見的實踐論，雖然龍樹中觀的中道思想，一再以否定的態度來蕩相遣執，但却是在建立否定之後的大肯定。佛陀在成正等覺、正遍知之前，也曾在縱我的樂行與克己的苦行中掙扎拉鋸，結果發現都是偏頗的斷見，凡夫因墮二邊故苦，經親驗外觀內察，徹悟離苦得樂的中道，必須轉識（情的世界，即感覺的世界）爲智，以智導行（緣起性空），這樣無我無私，自能利人利世，改造人生，完成人生的理想，漏盡現實的殘渣，得以事事無碍，成就自覺覺人的偉大人格。

當我們走過魏晉南北朝隋唐的時空，看到儒家面對複雜人生的大舞台，原由周易流衍而下的中道思想，接續舶來的大乘中觀的般若，萬流奔競，滙聚成更澎湃充沛的生命長流，注入無限信願的中華文化的慧海之中。

做爲現代的中國人，面對二十世紀聲色的世界，欲火焚心，惱海汜濫，疲勞奮鬥，終非究局。我們非恢復文化中圓融自足的中道生活，闡發中正剛健的生生常道不可。一些激進份子，既不體察先聖先哲的悲願深情（這是民族中最高貴的文化氣象），藐視傳統文化，又昧於天理人道的諧和，拒絕眞理，揚棄人倫，一味唯心唯物唯情（純感官的刺激）。緬懷先聖大哲，誠天地間一等情聖，以人間有情衆生的苦樂爲懷，那是孔子、佛陀。他們雖然對人生宇宙各有觀照、體證及肯定方向與化導方法上的不同，但旨歸一致，儒家的正德利用厚生成了顯學，佛家一切以有益資生爲世學，共同在使個人的生命意義獲得全體的尊重與開展，宇宙人生得以圓滿交融，往返無碍。

此刻，如果我們能體認出中道的義諦，必不爲周圍瀰漫的惡濁空氣所汚染，因爲煩惱即菩提，色即是空，眞實世界與感覺世界銜接。從罪惡的淵藪，多聞深思勤修，絕不厭世避世亂世。這樣恬淡平靜，寬舒適悅，既符合人的情感，心安理得，中正剛健，又符合人的理智，中道圓滿太和的性格，氣象萬千，莊嚴無限，庶可放諸四海、行諸百代！